

儿童在家庭中遭受心理虐待与在学校中受欺凌的关系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学业成绩的调节效应

□ 谢倩雯 陈柔嘉 孟 静

[摘要] 基于对 699 名初中生的问卷调查数据, 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社会支持对于儿童在家庭中受心理虐待和在学校中受欺凌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及学业成绩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 儿童在家受心理虐待正向预测其在校受欺凌, 领悟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学业成绩对中介效应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 儿童在家庭中受到心理虐待会加重其受校园欺凌的程度, 领悟社会支持可以缓冲这种负面影响, 但对学业成绩不佳的儿童而言, 领悟社会支持无法起到显著的保护作用。因此, 在校园欺凌防治中不可忽视对家庭关系质量的考察, 并应当为儿童构建多维度的社会支持网络。

[关键词] 家庭; 心理虐待; 校园欺凌; 领悟社会支持; 学业成绩

儿童^① 侵害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联合国明确将“制止对儿童进行的一切形式的暴力”写入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儿童侵害主要包括对儿童实施躯体虐待、性侵害、心理虐待、校园欺凌, 以及儿童目睹社区暴力等。一项基于我国 6 个城市 18341 名 15 ~ 17 岁儿童样本的研究发现, 有 71% 的儿童至少遭受过一种侵害, 有 14% 的儿童曾经遭受过多种类型侵害^[1]。遭受多重侵害的儿童比遭受单一侵害的儿童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等创伤症状^[2]。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从综合、系统的视角研究儿童侵害, 重视各类型儿童侵害之间的共生性和相关性。发生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等不同场景下的儿童侵害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但总体研究数量十分有限^[3]。基于此, 本

研究聚焦家庭和校园两个场景中儿童侵害的相关性, 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量化分析我国儿童在家庭中遭受心理虐待与在学校里遭受校园欺凌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儿童心理虐待, 又称为情感虐待, 一般是指发生在家庭内部, 由父母或者其他主要抚养者对儿童实施的一系列不恰当的抚养行为, 如恐吓、贬损、干涉、纵容和忽视等^[4]。抚养者实施心理虐待实则是向儿童传递他们是没有价值的、不被爱的、多余的等负面信息^[5]。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显示, 儿童心理虐待在我国的发展

① 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本文中的儿童是指 18 岁以下的人。

生率约为30%^[6]。由于儿童心理虐待较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等其他类型的侵害更具隐蔽性和不易测量性,因此相关的研究非常有限。既有研究主要探讨心理虐待对儿童的危害。例如,有研究表明,遭受心理虐待的孩子更有可能实施攻击性行为^[7]和自伤行为^[8]。心理虐待对儿童的认知、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功能均会造成不利影响^[9]。还有研究表明,儿童心理虐待具有代际传递性,儿童期遭受心理虐待的个体在成年后,比在正常环境中成长的个体更容易对其子女实施心理虐待^[10]。此外,有一些研究探索了儿童心理虐待的影响因素。例如,一项对我国学龄前儿童的研究发现,儿童受心理虐待的程度与其性别、年龄、家庭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11]。质性研究结果发现,“不听父母的话”和“学业成绩不好”是导致儿童(平均年龄14.7岁)遭受心理虐待的主要原因^[12]。

家庭和校园两个场景中儿童侵害的共生性和相关性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话题^[13]。校园欺凌是个体或群体对较弱势的个体或群体实施的长期反复性的负面行为,包含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等多种形式^[14]。校园欺凌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根据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全球范围内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正在遭受校园欺凌^[15]。2016年一项覆盖我国29个县约十万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有33.4%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16]。研究表明,遭受校园欺凌不仅会降低学生的学业表现^[17],还会造成学生低自尊和抑郁症状^[18],甚至可能引发自伤或自杀行为^[19]。近年来,在家庭中遭受心理虐待对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开始引起学者关注。现有证据显示遭受心理虐待是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因素^[20]。

一些研究从儿童个人心理特征角度探究受心理虐待对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例如:一项对我国2125名初一至初三学生的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可以调节受心理虐待和受校园欺凌之间的关系^[21];一项对我国4273名青少年的追踪调查显示,在家庭中遭受心理虐待正向预测在校受欺凌,青少年的

抑郁症状起到中介作用^[22]。目前,尚未有研究者从社会因素和教育因素的角度探讨受心理虐待对受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

在儿童侵害研究领域,社会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于社会支持的一种认知评价,强调社会支持接收者的主观感悟^[23]。领悟社会支持是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护因素,可以调节儿童因受校园欺凌而产生的抑郁症状^[24],并在儿童虐待与成年期患精神疾病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25]。但是,在心理虐待与校园欺凌的相关关系研究中,尚未见对领悟社会支持角色的探讨。研究者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儿童虐待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受性别和种族的调节,并且呼吁后续研究关注领悟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是否受其他个人因素的影响^[26]。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学业成绩受到学生及其家庭的高度重视,教育因素对儿童侵害的影响不容忽视。研究显示,学业成绩与儿童遭受心理虐待^[27]以及校园欺凌^[28]均存在密切的关系。此外,有研究发现学业成绩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29]。但是,极少有研究关注学业成绩是否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在儿童遭受侵害方面的保护作用。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本研究提出以下3个假设:

假设1:受心理虐待程度正向预测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程度。

假设2:领悟社会支持在儿童受心理虐待与受校园欺凌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3:领悟社会支持在儿童受心理虐待与受校园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学业成绩调节。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河南某初中开展调查研究。该校地处城乡交界地带,生源多样,且存在校园欺凌现象。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该

校初一至初三年级随机抽取班级进行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共发放7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99份,有效回收率为93.2%。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为12~15岁,平均年龄13.3岁(SD=0.90)。其中,男生367人(52.5%),女生332人(47.5%);城市学生585人(83.7%),农村学生114人(16.3%)。

2. 主要变量及研究工具

(1) 校园欺凌。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儿童受校园欺凌程度。主要采用张文新、武建芬编制的Olweus儿童欺负量表中文版^[30]中的受欺凌分量表,测量儿童受校园欺凌的程度,考察研究对象近3个月内受欺凌的频率。该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0代表“从未”,4代表“一周数次”,总得分越高说明受欺凌的程度越高。过往实证研究显示,该量表在中学生样本中(平均年龄 13.18 ± 0.90)信效度良好^[31]。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6。

(2) 心理虐待。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儿童遭受心理虐待的程度。使用由潘辰、邓云龙等人编制的儿童心理虐待量表,测量儿童在家庭中遭受心理虐待的情况^[32]。该量表由23个条目组成,分为恐吓、忽视、贬损、干涉和纵容5个维度,主要调查个体在儿童期(18岁以下)在家庭中受心理虐待的程度。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0代表“无”,4代表“总是”,得分越高说明个体主观感受的心理虐待程度越高。本研究采用该量表中“恐吓”分量表,共包含7个问题。该量表信效度表现良好,Cronbach's α 系数为0.84~0.87^[33]。

(3) 领悟社会支持。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领悟社会支持。使用由Zimet等^[34]编制、姜乾金^[35]翻译和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测量研究对象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3个维度,共12个条目,使用7点评分制,1表示“极不同意”,7表示“极为同意”,分数越高表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该量表在中学生样本中有良好的信效度^[36],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6。

(4) 学业成绩。本研究的调节变量为儿童的学业成绩,参考前人研究中对于学业成绩的处理方法^[37],通过“在刚刚过去的考试中,您有科目不及格吗?”这一问题来衡量学生学业成绩,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有”或“没有”。

(5) 人口社会学特征。本研究将可能干扰儿童在学校受欺凌的人口社会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以便科学识别心理虐待的影响及相关机制。通过自编问卷了解研究对象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包括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条件等。

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R(4.0.3)和M-Plus(8.3)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采用R(4.0.3)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性检验。采用王孟成建议的中介效应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流程^[38],在M-plus软件中采用Bootstrap法(抽样1000次)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受心理虐待和受校园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学业成绩的调节效应。参考过往对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研究^[39],本研究在中介效应分析中加入了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经济条件作为控制变量。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除性别等分类变量外,各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加入模型。

三、结果分析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通过描述统计发现,除男生有不及格科目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女生($\chi^2=10.87, p<0.01$)外,其他变量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受心理虐待($F=3.12, p<0.05$)、受校园欺凌($F=52.30, p<0.01$)和领悟社会支持($F=117.58, p<0.01$)在各年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初一年级学生受到心理虐待和校园欺凌的程度最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最低(见表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独立性检验

变量	组别	人数 n (%) (N=699)	心理虐待 (x±s)	受欺凌程度 (x±s)	领悟社会支持 (x±s)	有不及格科目 (n (%))
性别	男	367 (52.5%)	1.53±0.41	3.46±3.14	5.37±0.84	325 (89.0%)
	女	332 (47.5%)	1.50±0.43	3.20±3.30	5.46±0.79	264 (80.0%)
			F=1.44 p=0.23	F=1.15 p=0.28	F=2.26 p=0.13	$\chi^2=10.87$ p<0.01
年级	初一	188 (26.9%)	1.58±0.31	4.92±3.74	4.84±0.49	158 (84.0%)
	初二	148 (21.3%)	1.49±0.43	1.55±2.39	6.03±0.48	129 (87.2%)
	初三	363 (51.9%)	1.49±0.46	3.24±2.80	5.46±0.87	302 (83.2%)
			F=3.12 p<0.05	F=52.30 p<0.01	F=117.58 p<0.01	$\chi^2=1.26$ p=0.53
家庭所在地	农村	114 (16.3%)	1.55±0.43	3.15±2.98	5.42±0.78	99 (87.0%)
	城市	585 (83.7%)	1.51±0.42	3.37±3.27	5.41±0.83	490 (84.0%)
			F=0.71 p=0.40	F=0.45 p=0.51	F=0.00 p=0.97	$\chi^2=0.47$ p=0.49
父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325 (46.5%)	1.52±0.45	3.26±3.34	5.52±0.87	273 (84.0%)
	高中或职业高中	343 (49.1%)	1.51±0.38	3.47±3.07	5.29±0.76	290 (84.5%)
	大专及以上	31 (4.4%)	1.48±0.49	2.61±2.94	5.70±0.73	26 (83.9%)
			F=0.22 p=0.80	F=1.15 p=0.32	F=8.39 p<0.01	$\chi^2=0.04$ p=0.97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279 (39.9%)	1.57±0.46	3.50±3.42	5.41±0.86	245 (87.8%)
	高中或职业高中	366 (52.4%)	1.48±0.38	3.22±3.06	5.40±0.78	308 (84.2%)
	大专及以上	54 (7.7%)	1.47±0.47	3.26±3.26	5.58±0.83	36 (66.7%)
			F=4.06 p<0.05	F=0.61 p=0.54	F=1.16 p=0.32	$\chi^2=15.27$ p<0.001
家庭经济条件	较为富裕	41 (5.9%)	1.50±0.49	3.85±3.25	5.31±0.88	34 (82.9%)
	中等	617 (88.3%)	1.52±0.42	3.33±3.19	5.42±0.82	522 (84.6%)
	较为困难	41 (5.9%)	1.47±0.40	2.85±3.66	5.42±0.84	33 (80.5%)
			F=0.29 p=0.75	F=0.99 p=0.37	F=0.34 p=0.71	$\chi^2=0.55$ p=0.76

2.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 受心理虐待和领悟社会支持 ($r=-0.13, p<0.001$) 呈显著负相关, 与受欺凌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r=0.10, p<0.05$)。受欺凌程度与领悟社会支持 ($r=-0.48, p<0.001$) 显著负相关 (见表 2)。

3. 领悟社会支持在受心理虐待与受校园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3 中方程 1-3 所示。方程 1 中, 在控制人口社会学变量后, 初中生受心理虐待程度显著正向预测受校园欺凌程度

表 2: 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心理虐待	领悟社会支持	受欺凌程度
心理虐待	1		
领悟社会支持	-0.13***	1	
受欺凌程度	0.10*	-0.48***	1
M	1.52	5.41	3.33
SD	0.42	0.82	3.22

注: *为 $p < 0.05$, **为 $p < 0.01$, ***为 $p < 0.001$, 下同。

($\beta=0.08, p<0.05$) , 证实研究假设 1。方程

2 中, 受心理虐待对领悟社会支持有负向预测作用 ($\beta = -0.10, p < 0.05$), 受心理虐待的程度越高, 儿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少。方程 3 中, 领悟社会支持对受欺凌程度有负向预测作

用 ($\beta = -0.46, p < 0.001$), 即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学生受欺凌程度越低, 领悟社会支持在受心理虐待和受校园欺凌之间起中介作用, 证实研究假设 2。

表 3: 心理虐待对校园欺凌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以及学业成绩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方程 1: 受欺凌程度			方程 2: 领悟社会支持			方程 3: 受欺凌程度			方程 4: 领悟社会支持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心理虐待	0.08	0.04	2.07*	-0.10	0.05	-2.79**	0.03	0.04	0.90	-0.30	0.09	-3.90***
领悟社会支持							-0.46	0.04	-13.29***			
有不及格科目										0.16	0.12	1.57
有不及格科目 \times 心理虐待										0.25	0.11	2.87***
R-squared	0.03			0.07			0.24			0.10		
F	4.30***			9.21***			26.79***			8.33***		

注: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级、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所在地、家庭经济条件, 下同。

表 4 进一步展示了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分析结果, 可见受心理虐待对受校园欺凌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beta = 0.03, 95\% \text{ CI}[-0.03, 0.10]$), 仅间接效应 ($\beta = 0.05, 95\% \text{ CI}[0.00, 0.08]$) 和总效应 ($\beta = 0.08, 95\% \text{ CI}[0.02, 0.16]$) 显著, 说明领悟社会支持起完全中介作用, 即受心理虐待对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完全通过领悟社会支持产生显著影响。

表 4: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分析

效应	效应值 (β)	Bootstrap S.E.	95% CI
总效应	0.08	0.04	[0.02, 0.16]
直接效应	0.03	0.04	[-0.03, 0.10]
间接效应	0.05	0.02	[0.00, 0.08]
不同学业表现 下的间接效应:			
有不及格科目	0.02	0.03	[-0.02, 0.07]
无不及格科目	0.14	0.04	[0.07, 0.21]

4. 学业成绩对领悟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3 中方

程 4 所示。心理虐待和学业成绩的乘积项对领悟社会支持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eta = 0.25, p < 0.001$), 说明学业成绩能够调节受心理虐待对领悟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 即对“受心理虐待 \rightarrow 领悟社会支持 \rightarrow 受校园欺凌”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具有调节作用, 研究假设 3 得到了证实。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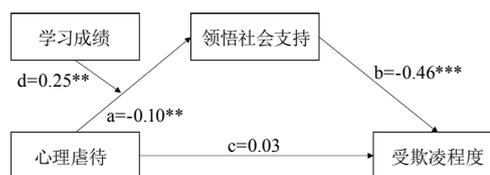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不同学业成绩下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对受心理虐待与受校园欺凌之间的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初中生在没有任何不及格科目的情况下, 领悟社会支持的间接效应显著 ($\beta = 0.14, 95\% \text{ CI}[0.07, 0.21]$); 而如果有不及格科目,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为进一步揭示学业成绩对中介路径前半段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进行简单斜率分析, 结果如图 2 所示。在没有不及格科目的初中生中,

受心理虐待对领悟社会支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beta = -0.30, p < 0.001$)；而在有不及格科目的初中生中，受心理虐待对领悟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 = -0.05, p = 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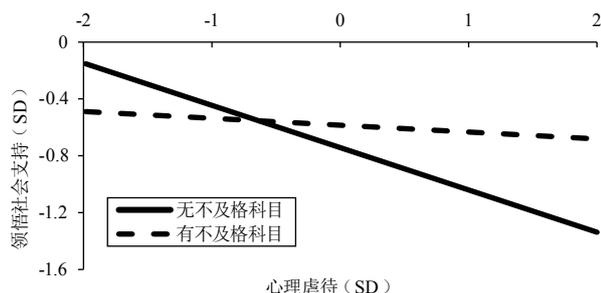


图 2：学业成绩的调节效应分析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河南省 699 名初中生的实证分析，本研究验证了儿童在家庭中遭受心理虐待与其在学校里遭受校园欺凌呈正相关关系。本研究虽然是小样本的横断面研究，但引入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并检验了学业成绩对社会支持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探究了社会因素和教育因素在心理虐待对校园欺凌影响机制中的重要性，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1. 研究结论

首先，本研究发现家庭和学校场景下的儿童侵害之间存在共生性，与前人实证研究的结论一致^[40]。根据溢出理论^[41]和家庭系统理论^[42]，个体生活在各个相互依赖的社会系统中（如家庭系统和朋辈系统），家庭关系会影响朋辈关系，冲突的家庭氛围会增加学生卷入校园欺凌的可能性^[43]。相反地，良好的家庭关系对于孩子产生同理心和共情的力量以及良好的社交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而同理心、共情力以及社交技能使孩子在学校与同伴更容易相处，可以有效防止其受到欺凌^[44]。

其次，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完全中介了受心理虐待对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呼应既有

研究指出的社会支持在保护儿童心理健康和防治校园欺凌中的重要作用^[45]。社会控制理论认为，社会支持可以加强个体与社会的关联，从而降低其参与校园欺凌等越轨行为的概率^[46]。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模型指出，个体领悟到外界对自己的支持可以缓解压力性事件造成的消极后果^[47]。其他实证研究也发现了领悟社会支持在儿童受校园欺凌方面的保护作用^[48]。

最后，虽然良好的社会支持对儿童具有保护作用，但本研究发现这一保护作用是有条件的：对于成绩不佳的儿童而言，领悟社会支持无法起到显著的保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学业成绩不佳不仅可能增加儿童遭受心理虐待^[49]和校园欺凌^[50]的风险，还可能削弱领悟社会支持的保护作用。在我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下，良好的学业成绩被认为是学生自我价值的重要来源^[51]。因此，学业成绩不佳的学生从社会环境中获得赞誉或认可相对较少，导致他们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较弱。在这种情况下，不良的学业成绩会通过限制他们获得社会支持资源的途径来加剧心理虐待的负面影响。

2. 研究启示

第一，在校园欺凌防治中不可忽视对家庭关系质量的考察，应着重识别和保护在家庭和校园中遭受多重侵害的儿童群体。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家庭教育力度，依法落实家长的教育责任的有关要求。这说明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已经认识到家庭在校园欺凌防治中的重要角色。因此，在基层防治校园欺凌的社会服务与工作中，可考虑将在家中遭受心理虐待等家庭暴力的经历作为校园欺凌风险筛查的标准之一^[52]。此外，应当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有关规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加强对监护人的教育与引导，打破“打是亲骂是爱”的陈旧观念，鼓励家长和孩子之间进行良性沟通，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并对不依法履行家庭教育义务的监护人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在校园欺凌防治工作中,应积极构建包括家庭、朋友、老师、社区及社会等多维度的社会支持网络。除了家长对于学生的保护,学生生活环境中的其他人也应成为其社会支持的来源。教师应当密切关注学生家庭状况和校园欺凌现象,对在家庭环境中遭受心理虐待的学生予以关心与呵护,尽量防止其遭受同伴欺凌。社区可以发挥自身的组织和协调作用,同学校和家庭一道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例如,社会工作者或儿童主任等可以通过入户访查对儿童遭受心理虐待或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进行摸排,通过组织专题教育活动或者座谈会受心理虐待或校园欺凌的孩子及其家长进行疏导和教育,为儿童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和朋辈关系提供有力的支持。

第三,为了增加儿童的社会支持并预防其遭受校园欺凌,学校和家庭务必深刻认识“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协同落实“双减”政策,改变“唯分数论”的评价观念,着眼于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从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学校是“双减”的主阵地,在短期内承担着减少学生作业任务、考试任务和努

力提供优质课后服务的职责。从长期来看,要真正将“双减”深入人心和落到实处,必须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深化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不再“唯分数”评价学生表现。从家庭角度来说,可以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家长会和开展家访等形式加强家长教育,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不过家长对于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焦虑无法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而快速减轻,这仍会是“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难点^[53],因此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需要全社会长期不懈的努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2024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浙江省儿童主观福利研究”(项目编号:23NDJC072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谢倩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柔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助理
孟静:河南省新乡市民政局科员
责任编辑/刘向宁

参考文献:

- [1] Chan K L. Victimization and Poly-Victimization Among School-Aged Chinese Adolescents: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s with Health[J]. Preventive Medicine, 2013 (3/4) .
- [2] Finkelhor D, Ormrod R K, Turner H A. Poly-Victimization: A Neglected Component in Child Victimization[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07 (1) .
- [3][13] Davis J P, Ingram K M, Merrin G J, et al. Exposure to Parental and Community Viol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to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Early Adolescents: A Parallel Process Growth Mixture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20 (1) .
- [4] 潘辰,邓云龙,管冰清,等.儿童心理虐待量表的修订和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4) .
- [5] Kairys S W, Johnson C F. The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of Children - Technical Report[J]. Pediatrics, 2002 (4) .
- [6] Wang L, Cheng H, Qu Y, et al. The Prevalence of Child Maltreatment Among Chines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20 (9) .
- [7] 于腾旭,刘文,刘方,等.心理虐待对8~12岁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认知重评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1(2) .
- [8] 甘明星,王蒙,林丽华,等.青少年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忽视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反刍思维和认知融合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5) .
- [9] 刘文,刘方,陈亮.心理虐待对儿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人格特质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18(1) .
- [10] 葛海艳.儿童虐待代际传递:母亲特质抑郁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作用[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9.
- [11] 陈晨.早期儿童虐待:发展轨迹、关联因素与问题行为[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20.
- [12][28][49] Leung P W, Wong W C, Chen W, et al.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ld Maltreatment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outhern China: A Large Scale School Based Survey[J].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2008 (1) .

- [14] Olweus D. Aggression in The Schools: Bullies and Whipping Boys[M].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1978: xiii 4 + 218.
- [15] UNESCO. Behind the Numbers: Ending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R]. Paris, France, 2019.
- [16] 姚建龙. 防治学生欺凌的中国路径: 对近期治理校园欺凌政策之评析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7 (1) .
- [17] 马帅, 侯金芹, 陈祉妍, 等. 同伴侵害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机制: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 中国特殊教育, 2021 (5) .
- [18] 常睿生, 张云运, 刘思辰. 初中生受欺凌水平发展与学业、自尊和抑郁水平的关系研究 [C]// 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 2019: 576-577.
- [19] Karanikola M N K, Lyberg A, Holm A-L,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liberate Self-Harm and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elf-Stigma: A Systematic Review[J].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8.
- [20][21] 朱紫. 儿童期心理虐待、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与初中生校园欺凌的现状及相关关系研究 [D].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20.
- [22][40] Li X, Huebner E S, Tian L. Vicious Cycle of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nd Bullying Perpetration/Victimization among Early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as a Mediator[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21 (C) .
- [23] Barrera M. Distinc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Concepts, Measures, and Model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6 (4) .
- [24] Guo J, Li M, Wang X, et al. Being Bullied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J]. Psychiatry Research, 2020 (2) .
- [25] Sperry D M, Widom C 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pathology in Adulthood: A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3 (6) .
- [26] Horan J M, Widom C S. From Childhood Maltreatment to Allostatic Load in Adulthood[J]. Child Maltreatment, 2015 (4) .
- [27][50][51] Xiong Q, Shi S, Chen J, et al. 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dolescent Bullying: A Moderated Moderating Model[J].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2020 (13) .
- [29] Song J, Bong M, Lee K, et al.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Adolescents' Academic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5 (3) .
- [30] 张文新, 武建芬.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9 (2) .
- [31] 刘小群, 陈贵, 杨新华, 等. 社会支持在初中生受欺负与自杀意念间的调节作用 [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 (9) .
- [32][33] 潘辰. 儿童心理虐待量表修订及流行病学调查 [D]. 长沙: 中南大学, 2010.
- [34] Zimet G D, Dahlem N W, Zimet S G, et al.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8 (1) .
- [35] 姜乾金.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1 (10) .
- [36] 陈维, 卢聪, 杨晓晓, 等.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多元概化分析 [J]. 心理学探新, 2016 (1) .
- [37] 鲍威, 金红昊, 曾庆泉. 学业辅导对高校学困生的干预效应研究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1) .
- [38] 王孟成. 潜变量建模与 Mplus 应用 (基础篇)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51-57.
- [39] 王怡涵. 我国中学生遭遇校园欺凌的情况及影响因素——基于四省市 PISA2018 数据的分析 [J]. 教育观察, 2021 (31) .
- [41] Parke R D, Ladd G W. Family-Peer Relationships: Modes of Linkage[M]. Routledge, 2016: 60-83.
- [42] Bowen M.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M]. Lanham, Maryland: Jason Aronson, 1993: 101-283.
- [43] 邓林园, 王凌霄, 徐洁, 等. 初中生感知的父母冲突、亲子冲突与其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1) .
- [44] 井世洁, 陈玉莹. 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研究 [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20 (5) .
- [45] 耿超. 社会支持与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关系研究 [J]. 校园心理, 2018 (1) .
- [46] Hirschi T. Causes of Delinquency[M]. Routledge, 2017: 16-35.
- [47] Cohen S, Wills T A.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J]. Psychol Bull, 1985 (2) .
- [48] 林少真, 杨佳星, 王蕾. 社会支持视角下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某中学为例 [J]. 教育科学研究, 2018 (4) .
- [52] Zhu Y, Chan K L, Chen J.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Role of Family Violence[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8 (12) .
- [53] 周洪宇, 齐彦磊. “双减”政策落地: 焦点、难点与建议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1) .